

北上广深积分落户标准出炉 落户大城市有啥门槛

■ 张尼

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征求意见后,11日,《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终于正式对外公布。至此,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全部出炉。

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设定了哪些指标?什么样的申请人更有可能拿到北京户口?落户一线城市有哪些“门槛”?诸多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积分落户北京有啥“门槛”? 需满足4个硬性条件

这部有效期为3年的《办法》从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办法》规定了申请人申请落户的4个资格条件,包括持有本市居住证、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7年及以上、无刑事犯罪记录。

积分落户每年申请一次,符合规定的申请人,可向用人单位提交申请,对比早前《办法》征求意见稿中的申请资格,记者注意到,“符合本市计划生育政策”一项被删除,而原本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也放宽至“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无违法犯罪记录”改成了“无刑事犯罪记录”。

申请人积分怎么算? 明确9大积分指标

此次北京公布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分为2项基础指标和7项导向指标。其中2项基本指标为在京稳定就业和居住情况。

例如,《办法》明确,申请人与在京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连续工作满1年及以上,以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年限作为合法稳定就业年限的计分标准,每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积3分。

再如,申请人如果有自有产权的住房,每连续住满1年可以积1分;租房并签正式合同或者住单位宿舍,每连续住满1年积0.5分。

另外7项导向指标包括:教育背景、职住区域、创新创业能力、纳税、年龄、荣誉表彰、



守法记录等方面,对每项指标赋予一定分值,总积分为各项指标的累加得分。

记者注意到,相比于征求意见稿,一些积分指标做了调整。例如,“在区域性专业市场、一般制造业、《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范围内就业的申请人,就业每满1年减6分”一项就没有出现在正式的《办法》中。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考虑到积分落户是一项人口服务管理政策,要以正面引导为主,积极传递社会正能量。吸纳公众意见,删除了部分减分指标,如疏解行业就业、迁入城六区居住和就业、企业信用不良记录等方面,使政策更好地发挥正面引导作用。

积多少分能落户? 每年根据人口调控情况划“分数线”

积分标准已经明确,那么申请人要积多少分才能真正落户?

对此,《办法》规定,北京市政府根据年度人口调控情况,每年向社会公布积分落户分值。北京市有关部门根据申请人积分情况和

落户分值,初步确定年度积分落户人员,并将其积分情况向社会公示。公示通过后,申请人可按相关规定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另外,获得积分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其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落户;其配偶、父母申请落户按照本市现行亲属投靠落户政策办理。

四大一线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均出炉 加分设计有区别 北上广均提出区域导向

伴随着《办法》的正式出台,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市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

由于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发展特点不一,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均提出了对积分落户的区域导向。

北京明确,申请人就业地和居住地均由城六区转移到北京市其他行政区域的,每满1年加4分,最高加12分;上海提出居住证持有人在该市重点发展的远郊区域工作并居

住满1年积2分,满5年后开始计入总积分,最高分值20分;广州则提出“政策导向区域”加10分。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北京对创新创业提出加分设计,上海、广州、深圳对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提出了加分设计。北京、深圳还对申请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多少设计了积分体系。

另外,四大一线城市对申请人群教育、工作导向有所不同。北京提出仅对具有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教育背景的申请人进行加分。

广州、深圳两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并不局限于高端人才和高学历人才。其中广州市明确表示为环卫工、公交司机、医疗人员等一线人员开辟入户新通道。

住,每满1年积2分,满5年后开始计入总积分,最高分值20分;广州则提出“政策导向区域”加10分。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北京对创新创业提出加分设计,上海、广州、深圳对投资带动当地就业提出了加分设计。北京、深圳还对申请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多少设计了积分体系。

另外,四大一线城市对申请人群教育、工作导向有所不同。北京提出仅对具有大学专科(含高职)及以上教育背景的申请人进行加分。广州、深圳两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并不局限于高端人才和高学历人才。其中广州市明确表示为环卫工、公交司机、医疗人员等一线人员开辟入户新通道。

积分落户意味着“开闸放水”吗? 北京或面临人口总量压力

积分落户政策实施后,北京的常住人口是否会瞬时增加?

对此,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策是将长期在京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符合条件的常住外来人口转为户籍人口,这意味着积分落户的人群是已经长期在北京生活的人群,因此短期看,这一政策不会导致常住人口的明显增长,但长期看有投靠落户政策的累积效果,会对人口总量带来压力。

从已经实施积分落户的城市实践看,上海从2012年起执行以积分制为主体的居住证制度,到2016年初共有2.6万人取得了上海户籍;2015年,广州积分落户的指标是4500名。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目前,北上广深已均明确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京提出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提出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广州提出控制在1550万人以内,深圳提出人口发展预期目标为1480万人。

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为2170.5万人、2415.27万人、1350.11万人、1137.89万人。也就是说,未来五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129.5万人、84.73万人、199.89万人、342.11万人。

11部门吹响企业提质增效号角 创新求变助力经济转型

■ 孙华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等11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新形势下,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提质增效,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稳增长的重要措施;是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有力支撑。

对此,北京大学校友创新联合会HR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余大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之后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外贸相对低迷、人力成本、原料成本迅速上涨,中国企业需要突破困境,同时亟待推动创新发展。

“企业的管理水平与经营状况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李永刚对记者表示,在整个经济发展环境并不有利的条件下,依靠创新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经营质量与效益,同样是扭转经济增速下行趋势,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稳增长的重要举措。

余大洪认为,中国企业目前面临三大挑战。第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消失,人力成本、原料成本迅速上涨,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创新业务模式,加强内部管理。第二,中国企业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其中,民营企业将操纵控制型的管理发挥到了极致,但同样也面临着发展的瓶颈。第三,企业之间存在低水平重复竞争,导致利润下降,甚至亏本经营。

余大洪表示,企业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发挥每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实现自我控制的管理。要把每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共创企业愿景,形成自下而上的创新。

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发展困局?李永刚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把着力点落到企业身上,政府的引导扶持规划和金融部门的支持对接只能起辅助作用,通过企业的提质增效才能实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对企业所面临的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企业管理创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要期望企业管理与经营会很快发生根本性转变。三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全面建立国有企业的现代法人治理体系。

民间资本喜欢哪些行业 “四新经济”是投资热点

■ 叶前

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增幅连续下滑引起政府和业界的高度关注。是民间资本对当前经济形势缺乏信心吗?其实不然。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了解到,在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四新经济”领域,民间资本表现很活跃,好项目、好企业“不差钱”。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民间投资增速从2015年全年的10.1%滑落至2.8%。为此,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部署扩大社会投资尤其民间投资的工作。虽然整体增速滑落,但在一些地区民间投资表现却比较活跃。宁夏、海南增速超过20%,体量大、基数高的江苏和广东,也分别达到11.1%和19.6%。在这些表现强劲的地区,除房地产回暖带动民间投资增长外,新经济也受到民间资本青睐,成为民间投资的“新蓝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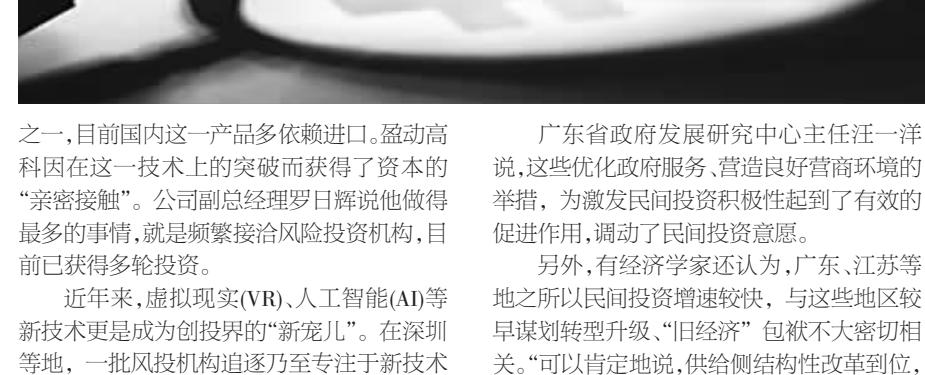
民间资本为什么热衷新经济领域?

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说,民间资本对市场的感知最为灵敏,像广东、江苏等地的新经济之所以能够吸引民间资本,说明这些领域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收益。

据广东省统计部门分析,从民间投资流向看,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信息产业是民间投资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1—5月,上述三个产业民间投资分别增长21.4%、30%、37%。与之对应的是,这些领域的经济数据也抢眼。统计显示,上半年先进制造业完成增加值6937亿元,增长9.6%,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9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完成增加值3865亿元,增长11%。

在民间投资总量最大的省份江苏,民间资本也表现出了对新经济领域的“偏好”。统计数据显示,苏州市民间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分别是智能电网和物联网、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新型平板显示以及软件和集成电路,增速均在20%以上,有的行业甚至翻番。

编码器是机器人中最核心的零部件



之一,目前国内这一产品多依赖进口。盈动高科因在这一技术上的突破而获得了资本的“亲密接触”。公司副总经理罗日辉说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频繁接洽风险投资机构,目前已获得多轮融资。

近年来,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更是成为创投界的“新宠儿”。在深圳等地,一批风投机构追逐乃至专注于新技术投资。由IDG资本、松禾资本等知名机构领投的柔宇科技,两年多里获得四轮融资,估值迅速跻身10亿美元,成为“独角兽”企业。

腾讯公司看好互联网医疗,预计其市场规模将达数万亿元,截至目前,腾讯已向10家公司累计投资约5亿美元;主打“名品+特卖”的电商唯品会已连续十多个季度盈利,唯品会CEO沈亚表示将在广州投资30亿元开拓新业务。

除市场外,环境的不断优化也激发了民间投资的热情。广东对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自主决定、自担风险、自行调节、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不再审批。去年,广东又对企业投资项目实行准入负面清单管理,除部分禁止投资及需要准入审批的项目外,大部分企业投资项目不再需要审批,同时启用全省统一的网上备案系统,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以外的项目,只需上传相关证照和项目信息即可完成备案。

上海有色网CEO范昕说,企业盼望国家在准予落户、信息共享、监管服务等方面继续优化环境,“企业生存得好,投资就会有连续性”。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说,这些优化政府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举措,为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调动了民间投资意愿。

另外,有经济学家还认为,广东、江苏等地之所以民间投资增速较快,与这些地区较早谋划转型升级、“旧经济”包袱不大密切相关。“可以肯定地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位,民间资本就不缺信心,市场就有活力。”陈鸿宇说。

尽管民间资本“热衷”新经济,但新经济的发展仍会遭遇“旧障碍”,市场准入限制以及“玻璃门”“弹簧门”“部门门”等现象依然存在。记者调查时有企业家反映,“一些领域的门是打开了,可走廊还很长。”这表明,企业对简政放权还有较高的期待。

西部某市一家新能源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一些项目表面看向民企敞开了大门,但设置的资质条件非常苛刻,如限定“企业要有30年以上行业经验”等,民企只能眼巴巴地“熬年份”了。

业内专家建议,还应从理念和政策上加大“拆门”破障力度,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

上海有色网CEO范昕说,企业盼望国家在准予落户、信息共享、监管服务等方面继续优化环境,“企业生存得好,投资就会有连续性”。

■ 李金磊

随着北京10日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至少已有重庆、辽宁、江苏、上海、海南、山东、天津、河北、北京等9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2190元,为全国最高。

今年9地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上海2190元最高



北京市人社局10日宣布,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每月1720元调整为1890元,增加170元。同时,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每小时18.7元提高到每小时21元。本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自2016年9月1日起执行。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至少已有重庆、辽宁、江苏、上海、海南、山东、天津、河北、北京等9个地区相续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具体来看,自2016年7月1日起,天津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950元,河北最高档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650元;自2016年6月1日起,山东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710元;自2016年5月1日起,海南省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1430元。

自2016年4月1日起,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从2020元调整到2190元;自2016年1月1日起,重庆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250元调整为1500元;辽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由1300元增加至1530元;江苏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涨至1770元。

其中,全国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是上海,达到219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也是上海,达21元。

最低工资增幅比去年有所下降

今年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7月8日在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6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去年是13个,前些年都是普遍提高,提高速度明显放缓。幅度也有所下降,这六个地区今年上半年提高以后增幅平均是11%,这是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的,去年同期13个地区提高之后平均增幅是13.5%。

信长星表示,相对于过去,中国人工成本上升,至少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不像过去那么明显。从工资的角度来考虑,确实有一个怎么去引导问题,要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工资的政策、工资引导上,应该是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提高的幅度。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工成本上涨较快,企业压力加大,再加上最近几年各地最低工资提升幅度比较大,频率也比较快,物价水平也保持低位运行,因此,现阶段需要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是一把‘双刃剑’,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需要把握好一个度。”苏海南认为,最低工资调快了,企业承受不了,职工可能要失业;但如果调慢了,职工的基本生活可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总之,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既不能给企业过大的压力,也要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